

社会理论译丛



为社会学辩护

In Defence of Sociology
Essays, Interpretations &
Rejoinders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为社会学辩护 · 为社会学辩护 · 为社会学辩护

· 社会理论译丛 ·

为社会学辩护

In Defence of Sociology Essays,
Interpretations & Rejoinders

安东尼·吉登斯 著

ANTHONY GIDDEN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为社会学辩护

· 社会理论译丛 ·

著 者 / 安东尼·吉登斯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皮书事业部

(010) 85117872

项目经理 / 张大伟

责任编辑 / 张大伟 程 秦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9.75

字 数 / 243 千字

版 次 /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101 - 0/D·035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3 - 7447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2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分工

第一、二、三、五、六章 周红云 译

第七~十四章 陶传进 译

第四章 徐 阳 译

前 言

这本书里的文章都是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期写作和发表的。在选择文章的过程中，我遵循两个主要标准：第一，我选的文章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映了本书的主题，从整体上，它们都有助于表明我所认为的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所占的重要位置的观点。同时，我还努力满足人们的一些要求，选择了一些不再付印的文章和许多人给我写信索要他们所需要的文章。这本书中既有长而大的文章，也有一些短而精的文章。

目 录

第一章	为社会学辩护	1
第二章	生活在后传统社会	8
第三章	什么是社会科学	63
第四章	功能主义：交锋之后	76
第五章	“英国特色” (Britishness) 与社会科学	108
第六章	人类学的未来	116
第七章	社会思想史中的四个神话	121
第八章	奥古斯丁·孔德与实证主义	146
第九章	法国社会学中的自杀问题	153
第十章	没有革命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	163
第十一章	文学与社会：雷蒙德·威廉斯	185
第十二章	汤姆·马歇尔：国家与民主	194
第十三章	勇敢的新世界：新政治背景	208
第十四章	工党与英国政治	223
参考文献	253
索引 (中英文对照)	282

第一章 为社会学辩护

社会学出现了一些其他学科没有出现的混乱。经济学可能是一门枯燥的学科，它充满了难以理解的术语，似乎与日常生活没有多大关系。社会学也经常被人指责为没有自己的研究主题，并且充斥着难懂的专业术语。当你和一位社会学家讨论黑手党问题时，你会得到什么答案呢？你将得到一个你无法理解的答案！

社会学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觉得社会学如此难懂？有些社会学家可能会回答说是因为无知；而另外一些人会说是因为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呢？这是因为他们喜欢把社会学的主题看成是危险的。他们可能会说，社会学经常提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因而很容易造成混乱：它向关于我们自己以及关于整个社会的看法提出了挑战。这使得社会学与政治激进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在 20 世纪 60 年代，许多人认为社会学确实无愧于这个说法。

然而，实际上，即使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社会学与左翼之间也并不存在内在的关联，更不用说与革命之间有什么联系了。社会学受到了许多来自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他们并不把社会学看做是革命性的，而把它看做是他们讨厌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体现。

实际上，在社会学发展的某些阶段，它与政治右翼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斯·韦伯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古典创始

人之一，他就更倾向于右翼而不是左翼，而且他对他那个时代所谓的革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和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对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根本不以为然。大多数社会学家在性格和政治上可能都倾向于自由主义，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及更近些时代的 R·K·默顿（Merton）、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戈夫曼（Erving Goffman）和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等许多著名的社会学思想家都是如此。

目前，在社会学一直很发达的美国，社会学也在经历一个困难的时期。一位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霍罗维兹（Horowitz）最近出版了《社会学的瓦解》一书，他说，在写这本书时，与其说是感到有必要写还不如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他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渐渐地变得枯燥无味了。最近，有三个社会学系，包括非常有名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系（霍罗维兹自己曾经在那工作过）都被取消了。耶鲁大学拥有美国最古老的社会学系，然而学校对它的投入也被砍掉了将近一半。

70年代以来的20多年的时间，美国社会学的本科生数量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从1973年3.6万人的最高记录下降到1994年不到1.5万人。然而，霍罗维兹认为，社会学遇见的困难还不仅仅体现在锐减的学生需求上，更重要的恐怕还与这门学科糟糕的学术状况有关。他指出，以前的社会学可能与总体的政治立场还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从60年代以来，它已经渐渐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了。社会学已经变成了对当前社会表示不满意的人的阵地，从同性恋权利的支持者到神学解放的支持者等这些特殊利益群体都聚集在社会学领地上。由于社会学渐渐变成了它的批评者所说的伪科学，而且还因为一些有名望的注重实证的社会科学家都流到了其他一些更细的领域，如城市规划、人口统计学、犯罪学或者法学，社会学渐渐衰弱了。社会学的退化并不意味着社会研究的瓦解，许多领域的社会研究仍然非常发达；但是，许多社

会研究都退化成纯粹的经验研究，再也没有了有价值的理论视角的指导。社会学所失去的是它为不同分支的社会研究提供统一中心的能力。

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以及其他学校社会学系的关闭已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霍罗维兹就是其中的一个。因城市贫困研究而著名的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认为，社会学已经与公共事务问题偏离的太远，并且应该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实际政策问题上。正如他所指出的，毕竟，随着城市的渐渐衰败以及与过去一样尖锐的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差异问题和暴力犯罪问题成为家常便饭，社会学家几乎不会缺少可以研究的社会问题。

社会学真是不景气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是美国特有的现象还是全世界都如此呢？抑或总像社会学的批评者所宣称的那样，社会学一直就是一个烂摊子？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样一个陈腐的笑话：社会学没有一个恰当的调查研究领域。事实上，正如多数社会学工作者所理解的那样，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没有其他学科定义得清楚。比如说历史学，它有自己明显的研究主题，似乎过去就是它的研究主题。但是，过去包含了任何一件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没有清楚明确的或者限定的研究领域，与社会学一样，由于方法论的争论，人们对历史学的真正性质的看法也完全不同。

社会学是一门概括性的学科，首先它涉及现代社会或者工业社会的现代性问题，也就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和动力学问题。不仅与历史学而且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一样，社会学有自己的方法论策略和方法论问题。社会学涉及的更经验性的问题是非常真实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最直接地涉及日常生活中与我们有关的问题，如现代城市的发展、犯罪与惩罚、性别、家庭、宗教、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等问题。

其实，在当代社会中，社会学的研究和思考总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很难理解诸如社会学是没有启发作用的以及社会

学就是用某些讨厌的术语武装起来的常识这一类批评的含义。尽管我们总是可以对某些具体的研究提出质疑，但是人们不能说进行诸如不同国家离婚问题的比较研究没有任何意义。社会学家对被证明是有意义而且被多数中立的观察者认为是重要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当然，其中有些问题是人们多少了解一些的。

然而，为什么社会学似乎经常研究一些明显是常识的问题，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更微妙的原因。那就是，社会研究不会而且不能与它所描述的社会世界分离开来。社会研究形成了今天我们视为当然的那部分意识。我们都依赖被我们看做是常识以及我们认为“每个人都知道”的那些研究。例如，每个人都知道，今天社会的离婚率非常高。然而，这种“明显的知识”也仍然是通过常规的社会研究得到的，无论这种社会研究是由政府研究者还是专业社会学家进行的。

因此，人们认为，对我们的社会存在来说，社会学并不是创造性的和不重要的，虽然实际上社会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就是社会学的命运。经验研究、社会学理论和学说，以及社会学概念都能成为我们日常知识的一部分以至于形成“所谓的常识”。例如，今天许多人都会问一个领导是否具有魅力、讨论道德沦丧问题或者谈论某人的社会地位，所有这些概念都来源于社会学语言。

很明显，这些说法无助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一门专业学科，自从60年代社会学的高峰期（如果那段时间确实就是社会学的高峰期的话）以来，它是否就处于一种令人同情的衰弱甚至消亡的状态中呢？在过去的30年中，社会学受到很多挑战，但并不是所有的挑战都是不利的。首先，权力中心发生了转移。过去，美国社会学占据了全世界社会学的主导地位，但是现在再也没有那种情况了。尤其是就社会学的理论建构而言，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地方，特别是转向了欧洲。现在，主要的社会学思想家不是来自美国，比如说，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卢曼（Niklas Luhmann）或者瓦里希·贝克（Ulrich Beck）等等。

美国社会学研究群体主要将其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己那一小块土地上，而不了解其他任何地方或者对其他地方没有任何兴趣，这使得它们变得过于专业化。美国社会学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域”，而且无论这个社会学者的专业方向是什么，它都能有效地定义其专业方向的特征。迷信数量分析（Quantophrenia）在美国社会学系中非常普遍。因为许多专业，只要你认为它没有价值，它就没有意义；至少可以说，这可能是一定程度上缺乏创造性的结果。

威尔逊建议社会学家从事与公共政策问题直接相关的研究并加入到他们的工作所可能引起的广泛的激烈讨论中去，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他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毕竟，政治领域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与诸如福利、犯罪或家庭等相关的社会学问题。社会学工作不仅与特定的政策问题相关，而且能够把握这些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

将社会学与公共决策问题重新联系在一起并没有阐述清楚上述提出的关于所谓的社会学的衰弱问题。为什么社会学解体呢？霍罗维兹又为什么如此重视呢？社会学是一门没有共同核心概念的学科吗？它是不是面临分解成毫无联系的不同专业领域的危险？而且最有创新精神的社会学家都已经移居到其他地方了吗？也许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学是否已经失去了它的锋芒？

如果将社会学与经济学进行比较，人们就不得不承认，社会学内部的差异要大得多。在经济学中，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和理论取向，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成了几乎所有经济学入门书的基本组成部分。社会学在同样程度上并不受单一概念体系的束缚。然而，这的确应被看做是一个优点而不是一个缺点。我认为，这种多样性并没有带来完全的混乱，相反，它表示了一种必定存在的多元性，尤其当人们研究人

类社会行为和制度这么复杂和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时就更是如此。

一些曾经被社会学吸引而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天才学者有移居其他地方的迹象吗？毫无疑问，在60年代，有些人从事社会学研究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学是新潮而流行的；现在，社会学再也没有了那种声誉。但是，大部分那样的人都可能对学术方面的事业并不感兴趣。与此问题更相关的可能是影响整个学术界而不仅仅是社会学的其他一些因素。许多曾经可能从事学术事业的天才的学者在今天不会再这样做，因为在过去的20年里，相比较而言，学术界的报酬已经急剧减少，而且工作条件已经恶化。

然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即英国社会学比以前做得更好了。例如，如果我们将近年来英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命运相比较，就会发现这一点。在二战后早期，这个国家以具有世界声誉的人类学家而自豪；相比较而言，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著名的社会学家。

然而，现在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颠倒过来了。如果说目前也还有人类学家的话，那也很少有人能够与前述人类学家所取得的成就相媲美。但是，英国社会学现在却有许多具有世界声誉的社会学家，如 John Goldthorpe、Steven Lukes、Stuart Hall、Michele Barrett、Ray Pahl、Janet Wolff 和 Michael Mann。

更重要的是，从纯粹统计学的角度来说，英国社会学并没有像美国一样在走下坡路。高级社会学并没有衰弱，而是非常流行并且繁荣发展。在大学招收的学生中，与其他专业相比较，社会学专业至少是稳定的。

社会学的花园中并不总是一片好看的玫瑰红色，尽管过去可能是这样。从70年代以来，对社会研究的资助已经锐减了；人们对实证工作也没有一种衡量的标准。但是，如果人们拓宽一下自己的视野并且回到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就很难说社会学是落后的。今天，在整个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的争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多数问题都引进了社会学的内容。在后

现代主义、后工业和信息社会、全球化、日常生活变革、性别与性、工作和家庭性质的变迁、“底层阶级”以及种族问题的争论中，社会学者领导着潮流。

你仍然可能会问：所有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呢？在这里，我要说，社会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一些必定是调查或者经验研究工作，但有一些必定是理论工作。社会学不仅仅要发展学术本身，而且社会学思考对于我们把握重构今天生活的社会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生活已经变得分散而多元，充满了许多新的不确定因素，这时，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社会就成了社会学创造性思维的事情了。关于这一点，威尔逊的看法自然非常重要：社会学家应该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当前那些改变社会生活的变迁的实际意义及其政策决策方面。然而，如果社会学还不关注它的大问题，那么，社会学的确会变得越来越沉闷，而且很有可能瓦解。

当新自由主义随着正统社会主义消失殆尽之时，社会学应该重新磨一磨自己的刀刃。有些亘古的问题，我们需要新答案，而有一些问题本身就是新产生的。与以前的时代一样，要想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就需要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想像力这剂良药。社会学家们，请不要灰心失望！你仍然可以赢得一个世界或者至少可以说明和解释这个世界。

第二章 生活在后传统社会

就像社会世界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样，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本身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2000年不仅仅是一个世纪的结束而且是一个千年的结束：这种没有任何实质内容而且完全武断的事物（它只不过是日历上的一个日期而已）却有那样一种具体化的力量，以至于它将我们牢牢地束缚住了。20世纪末已经被普遍认为是迷失了方向，以至于人们可能会怀疑是否所有与结束有关的话题，如现代性的终结或历史的终结等都只是对它们的简单体现。毫无疑问，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事实。然而，这当然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处在明显的转型时期，这里的“我们”不仅指西方而是指全世界。

在这篇文章中，我谈的是后传统社会的出现问题。乍一看，后传统社会这个阶段似乎挺奇怪的。几乎所有的定义都认为，现代性总是与传统相对立的；难道现代社会一直都不是“后传统”的吗？从我的角度来说，现代社会至少不是在这篇文章中所讨论的后传统社会。从现代社会的大部分历史来看，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重构了传统本身。在西方社会，传统的继续与重构对权力的合法化至关重要，对国家能够强制相对被动的“主体”这个意义上的权力的合法化更是尤其重要。传统就是指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家庭和性认同就是相当重要的方面——停滞不变，就“激进的启蒙运动”来说，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在很

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被触及。

尤为重要的是，只要“现代的”依然只意味着“西方的”，那么，传统在现代性范围内所产生的持续的影响就仍然不明显。今天，由于现代性在全球的普遍化，它已经被迫“苏醒过来”。尽管再也没有了还未考察的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的霸权基础，但是，现代性的规则与社会形式仍然有待仔细研究。

变革的规则

社会科学的新任务涉及两个直接相关的变革领域。每一个都对应于不同的变迁过程，它们随着现代性的早期发展而出现，而且在当代已经变得尤为剧烈。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过程而普遍化的现代制度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另一方面，与制度变迁直接相关的是观念变迁过程，观念变迁可以被看做是现代性的激进变化。这些变迁都是传统的消除过程，也就是传统的发掘与问题化过程。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地方性活动受到遥远地方的事件和机构的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至少在粗略的水平上，人们可以很容易指出这一现象。例如，正如马克思和其他许多人证明的那样，多少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一直有强烈地扩张倾向。然而，从一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在过去的40年里，资本主义的扩张模式已经开始改变。它已经变得更倾向于无中心，以及越来越无所不包了。当然，总体倾向是趋于越来越大的相互依赖。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说，世界生产已经有了大幅度地增加，虽然也伴随着各种波动和低迷时期；而且世界贸易（一个体现相互联系的更好的指标）甚至增长得更多。服务业和金融领域的“无形贸易”增长得最多。

事情的另一面总是不太清楚。其实，今天我们个人的日常行为也与全球性相伴而生的。例如，我做出购买某一件衣服或者

某一种食物的决定总是有多方面的全球性意义，它不仅影响到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某人的生活，而且可能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而这种生态的退化本身会对整个人类产生潜在的后果。日常决定与全球性的后果之间的这种特殊，以及仍然在不断增加的联系和全球秩序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形成了今天新的议事日程的重要主题。这其中的联系常常非常紧密，各种中介的集体和群体包括国家在内也因此而没有消失；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实倾向于重新调整或者重组。

启蒙运动思想家及它们的追随者认为，掌握越来越多的有关社会与自然界的的信息将导致人们对它们越来越多的控制。许多人认为，这种控制是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关键；整个人类越是处于一种积极创造历史的位置，我们就越能够引导历史朝我们的理想前进。甚至越来越多的悲观的观察家也将知识与控制这二者联系在一起。马克斯·韦伯的“如钢的牢笼”就是一座技术知识的监狱，他认为，在这个牢笼中，人类注定是为了可预见的将来而活着的；要改变这个说法，我们都将成为技术理性和官僚理性这个庞大机器上的小轮齿。然而，想象无法捕获这个高度现代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比任何想象的图景都要不确定和易变得多，而这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关于我们自身，以及这个物质环境的知识造成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同时存在的世界。

我们越是努力去开拓将来，我们就越可能会大吃一惊。这就是为什么风险（它是现代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首先它似乎只是基础计算方法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种确定被触及的将来之界限的方式。这种形式的风险就是保险公司业务的一个统计部分；这种风险计算方法似乎标志着成功地使将来处于被控制之中。

这是一个很多事物都处于“给定”状态下的世界中的风险，其中包括外部自然界，以及那些受传统影响而被调整的社会生活形式等。当自然界被人类的社会化所渗透甚至因此“终结”，而

且传统也完全消解时，不可预测性和不可计算性的新类型就会出现。例如，全球变暖就是这样。许多专家认为，全球变暖正在形成，而且这些专家可能是正确的。然而，这个假设受到一些人的怀疑，他们甚至认为，如果的确只有一种趋势的话，真正的趋势恰恰是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也就是是在朝全球气候变冷的方向转变。也许，大多数较为肯定的说法只能是，我们不能肯定全球变暖没有发生。然而，这样一个条件性的结论产生的不是对风险的精确计算，而是出现一系列的“情况”——其可能性的大小将受到确信全球变暖这个趋势并据此采取行动的人数的多少的影响。在社会领域中，制度性的反思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情况”的复杂性甚至越来越明显了。

因此，从全球层次来说，现代化已经变成了试验性的。无论愿意与否，我们都要加入到这场宏伟的试验中，作为能动的主体，我们在这个时候所做的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我们的控制。这不是一个实验室意义上的试验，因为我们不能控制在给定参数的情况下将得到的结果，这更像是一次危险的冒险活动，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每个人都不得不参加这次冒险活动。

现代化这场宏伟的试验充斥着全球性的冒险，它根本不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们在谈论与传统做斗争的重要性时所想要做的事情。社会领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以有意识的方式被组织起来，自然界也依照人类想象的方式被塑造，但是，至少在某些领域，这些环境已经产生了比以前更大的不确定性。

全球性的现代化试验与现代制度渗入日常生活细胞的过程相互交叉，并影响着这个渗透过程，正如这个渗透过程也对这场试验产生影响一样。不仅仅是地方社区，而且具有隐私特征的个人生活与自我都与不确定的时空关系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都加入到这种日常的试验中，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试验的结果与对整个人类产生影响的结果一样都是不确定的。日常试验反映了传统的作用不断发生变化，全球层次的试验也是如此，在引入抽